责编：云帆 E-mail:yunfanwenzhai@foxmail.com Tel:010-62808639

塑造更加开放更有秩序的城市品格

□郭新双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面对日益多样化、碎片化、流动化和陌生化的社会变化，如何完善体制机制，以开放的、适应市场竞争的秩序来整合社会资源，提高社会治理能力，建设美丽城市，是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有关改革开放思想的必然要求，很值得我们认真考量。

社会秩序或者说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竞争秩序，实际上触及了中国古代文化当中一个最核心的问题——“治”。我们都知道大禹治水的故事。《尚书》的描述是：汤汤洪水方割，浩浩怀山襄陵。原来的样子叫做“汩”，大禹吸取了他父亲鲧的教训，把原来混乱的洪水秩序化了。秩序化本身就是治乱的根本手段。所以在古代文化中，“治”这个字是从水的。鲧禹治水实际上属于两种行政手段。一种是“堵”，越管理越混乱；另外一种是“疏”，用“秩序”的办法，结果实现了良好的管理效果。

秩序之于城市，就像规矩之于方圆；也如同准绳之于平面。一座城市失去了秩序，就失去了文明和自由，从而陷入混乱与黑暗。历史发展和实践证明，城市发展的脚步越快，对社会秩序的要求就越高。秩序跟城市环境一样，是城市魅力的直观体现，是城市的门楣，是城市文明素质、管理水平的重要标志，更是一种城市竞争力，会给城市带来无穷的发展机遇。在这个预设的前提下，重新建构城市的“美丽”，克服疏离异化的问题，对于我们地区的政治发展、经济发展都是相当重要的因素。

如何让开放的脚步迈向“五湖四海”，以改革重构优良秩序去“海纳百川”，积极传递正声音、正能量，团结一致把齐齐哈尔的事情办好，这其中“疏离”了的开放意识、“异化”了的竞争秩序，已经成为影响我们政治、经济发展环境面向正前方的阻碍。就像我们的城市交通，一台车辆的违章会立即引起相邻道路的堵塞，进而影响市民出行的生活安排。这也就是大家所熟知的“蝴蝶效应”，看似微不足道的细小变化，却能以某种方式对社会产生微妙的影响，甚至影响整个社会系统的正常运行。应用到社会学上，一个坏的微小的机制，如果不加以及时地引导、调节，会给社会带来非常大的危害，我们可以称为“龙卷风”或“风暴”；一个好的微小的机制，只要正确指引，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将会产生轰动效应，我们就叫它“改革”。

毛泽东说：“我们不但要善于打破一个旧世界，还要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通常建设总是比打破要难的。齐齐哈尔沉积的矛盾比较突出，且一些问题越来越严重，除了我们经济总量偏小、城市化率太低以外，市场经济秩序的缺失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多年来，一些同志认为“我的地盘我做主”就是秩序，害怕把自己控制的资源和机会交给市场去配置，其实质还是封闭、保守、僵化。在这个规矩下，别人要获得发展机会就得搞小动作，就人为制造出寻租的空间。而经济社会发展一旦动了他的“奶酪”，就会跳将出来大闹公堂，甚至是宁可风化了坏掉了也不与人分享。李克强总理说，“触动利益比触及灵魂还难”，这个难就难在社会发展所要求的新秩序触痛了那些既得利益者。

要解决“疏离异化”问题，回归旧体制是绝对不能走也是绝对走不通的道路。100多年来，建立良好的市场竞争秩序一直也是发达国家苦苦探求的课题。对我国这样的转型经济国家来说，更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今天，秩序（及其创造的公平）已经成为一个关乎社会健康发展的全局性命题，它在我们的政治生活和经济发展中扮演着一种指导行为准则的角色。而对竞争秩序的构建与维护，是市场体制能够运作并取得效果的关键，这也决定着齐齐哈尔的发展理念，决定着整个城市的走向和出路。现在正是一个“时间窗口”，我们迫切需要这样一种大无畏的精神、一场背水一战的革新，重构我们城市的精神秩序、文化秩序、社会秩序及治理模式，也就是要转向优良治理导向，通过促进公平有序竞争，获取我们这座城市发展的最大红利。

首先，建立良好的市场竞争秩序要求我们必须牢固树立开放性和包容性的发展理念，加快转变城市社会传统的发展模式。齐齐哈尔800多年的建城史以及独特的地缘区位并不缺少这样的胸襟和潜质。自清康熙38年起为黑龙江省省城，我们一直以“扼四达之要冲、为诸城之都会”的紧要之地闻名遐迩，并历史性地维系着八方情感。我们这片土地上，也不乏开放包容的文化基因与文化特质，古老的昂昂溪文明、共和国创建的工业文明，绚丽多彩的民族民俗文化和宗教文化，数百年的流人、站人边塞文化，以及汇聚的俄罗斯文化、抗战文化等，都塑造了我们这座城市的深厚底蕴。只是我们经历了太过漫长的计划经济时代，又经历了比较长时间的转轨阶段，曾经的辉煌与发展的困惑让我们耽于安逸、怯于竞争。尽管多年来齐齐哈尔历届领导班子一直致力于改革开放的探索实践，但某些思维、行为惯性并没有纠正。

纵观世界城市发展史，一个城市要有前途，第一是要多样化；第二是要有比较集中的企业，可以掌握资源；第三是要有群聚性，吸引一些产业集合、融合进而扩张升级。比如纽约、巴黎、西雅图，它们都是标准的国际化城市，从居民来源到配套实施，从经济发展到多元文化，从社区特色到投资环境，从政府政策到市场行为都是开放、平等和全球化的。四川成都，也以地产国际化充分显现了城市发展的博大胸怀，无论技术的先进性、功能的合理性、空间造型的振奋性，还是环境的可持续性，都用现在和未来、本土和世界碰撞出了火花和共鸣。我们强调更加开放、更有秩序，其目标就是“要对地区的和谐增长作出贡献”，因为它将大大缓解以往由于发展机会不平等造成的发展结果不平衡，做到权利公平、机会均等、规则透明、分配合理，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其次，建立良好的市场竞争秩序必须按照中央精神深化改革，发挥市场在结构选择上的择优功能，促进形成公平竞争的环境。党的十八大报告里有两句非常关键的话：第一句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第二句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那么，我们有四个问题要明确：一是当前存在的诸如创新力不足、国民收入分配不尽合理、市场秩序建设滞后于市场规模扩张、以权钱交易为基本特征的寻租等问题，主要还是由于市场机制不完善、改革不深入引起的。比方说国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并非来自真正的市场竞争，并非来自公平市场竞争中能力和效率上的差距，而更多地来自不公平竞争，这种差距的缩小，要依靠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竞争秩序，而不是取消市场竞争。二是市场经济是鼓励竞争的，因为只有竞争才有进步，才能最后使我们的城市和百姓受益。显然，在已经颇有市场的排斥竞争这个问题上，政府的关键作用就是要反对垄断，重点是反对个人或企业利用垄断地位来谋取不正当的利益。只要新的竞争者合乎条件，又具有更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水平，就欢迎进入，这就有可能迫使那些较差的、成本高的企业退出市场。三是政府的审批制，这在不少情况下实际上是政府对市场的不公平，审批只是加强了政府的权力，限制了市场的效率，同时也滋生了大量的腐败。要真正下决心改革审批制，就应当像邓小平说的，政府不应该管那些不该管、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情。比方说我市推行的“三集中，三到位”，通过流程再造、政务公开等制度建设，健全了一整套行政运行机制，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四是放权、自由、效率，是我国经济改革的核心和主线，而好的改革要在公平和效率间实现平衡。我们长期有着一种追求，总是希望把一切事都管好，但事实证明大包大揽是万万不能的。我们必须在一切该放开的地方全部放开，让人民群众的自我治理能力得到培养，让人民群众去自主地处理他们能够处理的事情。如果改来改去，权力向上集中了，垄断加剧了，竞争的程度降低了，那就不是改革，而是倒退。当然，如果在放权、自由、效率中损害了公平，越来越让极少数人受益，越来越多人受损，这也不是好的改革。

再次，建立良好的市场竞争秩序，就必须按照法治的要求规范权力运行秩序。规范权力并不是把权力管死，目的是要让权力沿着其应有的方向运行，发挥其正能量。总的是要明晰流程控制，让每一个具体行政行为都在规范的流程中运行，防范权力截流、权力倒流等“权力紊乱”风险。但这里的前提是要突破“既有利益阶层”的垄断，当然，这个垄断并不是指经营性垄断，而是指行政性垄断，即通过行政干预限制公平竞争所产生的对市场的独占。突破了它，我们就能有效地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牢笼，就能将某些所谓的约定俗成、强制性的社会秩序，通过稳定的、规范合理的政治经济规则提供给社会，进而完全抹去经济领域中权力行为和个人利益的影子，形成各类主体公平竞争的政治环境、政策环境和市场环境。

齐齐哈尔已经到了一个关键时期。与全国各地区的发展速度比，与区位相当、规模相近的城市比，与省内其他地市加速发展的态势比，拉开的距离超乎想象。我们已经为落伍的体制和制度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如再不及时革新，经济发展很可能无法持续。任何改革及其利益的调整都十分痛苦，但延误越久，调整的痛苦就越剧烈。我们不能总是左右摇摆，现实也逼迫我们必须尽快走出困境。现在，只有建立一个更加开放的、适应市场竞争的优良秩序才是齐齐哈尔走向振兴的根本出路。

（作者系中共齐齐哈尔市委副书记、人民政府市长）

渐进思维打造成的“好政府”

——赴新加坡学习考察有感

□王韶辉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所选择的是好政府模式，而不是西方的民主政府。人民行动党清醒而现实地认为政府应当时时替人民着想，处处为人民谋利。执政31年的李光耀，用渐进性的思维、从务实的角度形成的价值观是政府必须廉洁有效，能够保护人民，让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在一个稳定有序的社会里取得进步，并且能够在这样一个社会里过着美好的生活，培养孩子，使他们取得更好的表现。

人民行动党强调“有好的领袖才能有好的政府”。这里散发着浓厚的儒家思想：为政在人。新加坡非常注重法治建设，其执法之严格也闻名于世，然而，执政者却坚定地认为，法制若没有贤人这一决定因素，再先进的执政理念，再好的法律制度，可能只是政客的口号或行政的空文。

新加坡的治国精英、贤能的产生概括起来有两个鲜明的优势：其一，是由人民民主选举产生，从群众中来，这样一方面他们有民众基础，另一方面他们具有合法性。其二，人民行动党有一套七个程序，完善而严格的发现、选拔、任用的制度和方法。其过程是公开的，是集体过关的。前者保证其具有民众基础，后者筛选使其具有贤能资质的保障。这样的执政者综合素质是可靠的，无论是政党，还是民众，抑或社会是有信任感和值得期待的。

2012年全球反贪机构透明国际公布的年度清廉指数显示，新加坡以87分蝉联第五名，为亚洲唯一进入前十名的经济体。之所以有这样成就，从本次笔者的考察中发生的一个小故事可以透一斑而窥其全貌。

在我们回国的前一天中午，新加坡外交部设宴送行，陪同我们就餐的一名外交官，看到笔者手中的一本袖珍小书，非常好奇，听说是《孙子兵法》，更为感兴趣。出于对她的友善和热情的感谢，笔者将价值6元人民币的小书签名赠送与她。她先是委婉拒绝，后在同学们的劝说下，以“文化交流”之名，才收下。不过，她说了如下的话：“这本小书，由于您真诚的写上了我的名字，有可能是我的。在我拿回去之后，上报进行登记和评估，我购买，归我本人，谢谢您，中国朋友。”

从这个细小的事情上不难看出，新加坡对公务员廉洁管理是有明确有效的事前事中事后制度的，公务员执行制度是自觉而常态自然的，已经具有文化浸透的力量。这样的政府官员或公务员是集体行为而非个案。还有一例，一名警察在处罚一名交通违章者，这个违章者欲贿赂警察，警察警告他，你若通过贿赂来免于处罚，实际上你会两罪并罚，即增加贿赂罪。而警察上报之后会得到加分等激励。如果，警察接受了贿赂而被查实，其结果可能会失去饭碗，被记录在案，同时搭进了未来的成本。于是，可能的对法律尊严的挑战行为和腐蚀执法人员的行为就会终止。

新加坡在人民行动党执政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一直是个贪污盛行、腐败成风的地方。公务员利用职权索取“咖啡钱”即保护费等现象比比皆是。李光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执政后，于1960年制订了《防止贪污法》，赋予贪污调查局有效的职权，整饬腐败。并逐步配以其他制度的、文化的、法律的手段和措施，从而达到：以德倡廉，使人不想贪；以俸养廉，使人不必贪；以规固廉，使人不能贪；以法保廉，使人不敢贪。赢来了吏治清明，民风淳朴，政府清廉。

在新加坡学习考察中，有幸观摩了新加坡议员接待民众的情况。我们去的是蒙巴登单选区。该区只有一个国会议员林谋泉先生，林先生是人民行动党党员，他是新加坡著名律师。每周二是该区议员约定接待日。我们亲历了两个接见案例。一个是一家三口，其问题是，男主人是新加坡人，妻子是菲律宾人，其妻子刚取得新加坡永久居民身份，现在反应的诉求是，孩子也要求获得新加坡永久居民身份，因为，会有好多的公民待遇。林先生向其作出将帮助的答复，并在问题登记表上签字，其团队的义工会按照权属和职责函件至有关政府部门，并跟踪解决。另一个是一个青年人，因骑摩托车，闯红灯被罚款，欲寻求减轻处罚。林先生向其做了帮忙的承诺及可能性的分析与解释。时间共计不到5分钟，两拨人都带着满意与放心的表情离开了接见所。当晚有二三十个民众，有序地在按照程序进行着，各种大大小小问题都有，但都会被准确记录和耐心的接待。

身为议员，就在民众身边，时刻代表着、倾听着民众的声音，解决着民众反应的问题，拉近了政府与民众的距离，在民众与政府之间建立有效的桥梁，既解决民众反映的问题和诉求，又凭借着自己对政策的了解起到宣传政策运用政策的作用。

新加坡用50多年，取得如此的成就。不是好高骛远理想化的一步到位实现的，而是选择渐进性的务实推进。从治国理念到党的宗旨，从法律制度不断完善到政府政策务实调整，从廉洁政府到清廉官员的打造，从权力公用到权力制衡，从民主的有效性放开到权威政府的代议制作为，从议员的从民众中来到民众中去，从法治政府到和谐社会的形成，从精英治国到民众普遍的素质提高，无不是在务实中渐进性的形成。有效地将西方民主法制思想与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相结合，成功地走到先进发达国家前列，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

（作者系新疆自治区煤炭工业管理局副局长）

韩国政府在促进大企业发展中的作用

□李阳春

据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官员介绍，自1960年代初朴正熙上台后，政府集中精力促进经济增长，实施了以政府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战略，兴建了一批高速公路、港口等宏大的基础设施，鼓励和刺激出口，超常规建设基础设施，特别是将国内稀缺的资本集中起来，支持大企业的发展。由此，以三星、现代为代表的家族财团依靠政府支持的银行贷款迅速崛起和扩张，使韩国仅用30年就迅速完成了工业化和现代化，成为世界第15大经济体。到2012年，韩国人均年收入达到23679美元，制造业所占比重为31.2%，服务业58.1%，出口额达5480亿美元，在世界市场处于优势的产品超过100种，进入全球10个人均收入超过2万美元的富裕国家之列。韩国政府支持大企业发展的主要措施有以下几方面。

用政府经济增长计划进行引导。上个世纪60年代初至80年代，政府先后制定了五个经济增长5年计划，针对国内需求不足以维持增长的状况，实施出口导向型的不平衡增长战略，专注于轻工业的产品制造和出口，在1960年代保持了经济年均7.2%的高增长。

重组产业结构，推动企业由轻型化向重型化发展。1970年代，第一次石油危机发生后，由于过度投资造成国内石油化工产能过剩，韩国政府对产业结构进行了重组，重点培育发展造船和汽车制造业。起亚、现代等韩国品牌汽车企业开始起步，三星这时也涉足了造船业。同时，政府通过各种福利计划、指导方针、税务计划以及加强监管等，来引导新的领域作为增长引擎，由此创造了大量工作岗位。国民自身也加大了教育的私人投资，创造了强大的人力资源储备来支持经济增长。

推行经济开放政策。通过土地、公营公司所有权和公债使用权的重新分配，并通过制定保护财产的法规，创造和鼓励更大的集团公司成长壮大。支持大企业的投资项目和加快全球化进程。在1990年代调整封闭型的经济政策，开放进口和外商投资，让国际产品和企业进入韩国市场，倒逼国内企业提高竞争能力，开拓国际市场。三星、现代等大企业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发展成为真正的全球企业的。

帮助大企业渡过金融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重创了韩国经济，直到2000年，其金融体系都处于IMF的监管之下。政府一方面鼓励产业转型，分拆、外包原属于政府经营的项目，出售了大量海外资产，推动公共企业私有化大力推动发展IT业和创意产业，打造首尔创意设计之都。鼓励国民购买本国企业产品，还号召国民捐出金银等贵重物品，帮助企业开拓国际市场。三星、LG、现代、乐天等企业正是在这次危机中得以强身健体，为本世纪第一个十年的腾飞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和力量。韩国政府过去几十年推行的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是适合韩国面积小、资源不足的国情的，推动实现了韩国经济在较短时期内的快速起飞。但是，随着韩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世界经济结构调整的加剧以及全球产业竞争格局的变化，这种经济发展模式引起了不少非议，面临着新的挑战。这主要表现在大企业的霸主地位严重挤压了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据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官员介绍，目前全国有360万家企业，除了3000余家超大型、大型和较大型企业外，99%都是中小企业，占产值的47%，提供就业80%。由于政府把扶持重点放在大企业身上，中小企业在很长时间没有良好的成长环境。政府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中小企业整体上仍然未能从困境中摆脱出来，生产性中小企业所创利润由过去占大企业50%降到目前的30%，出口份额也只占30%。每况愈下的中小企业和高涨的社会不满情绪，给近期韩国经济留下了阴影。大企业经营透明度低，且与政府的关系过于暧昧，容易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韩国大企业都是家庭控制的财团，透明度低是一个历史性问题，一直饱受诟病。另一方面由于对政府权力影响很大，在韩国经济中的地位又举足轻重，以至于常被当政者“网开一面”。腐败现象在韩国其他大财团也时有发生，如现代的老板郑周永也曾转入贪腐案。

有一种说法是，三星等大财团“绑架”了韩国经济，定制了百姓生活，它让一个人完全靠一个公司提供的产品、服务生活成为可能。这种影响也许用数据和言语都难以表述。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是，三星在中国的影响也越来越大。虽然华为、中兴、联想、海尔等企业在中国知名度很高，但是相比三星的体量和发展，前者目前都是无法企及三星的。

我们在考察调研中注意到，近年来，韩国政府管理和服务企业的方式也开始发生一些新的变化。在2008年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李明博政府提出了《新成长动力规划和发展战略》，其产业政策已经从过去偏重于支持大集团发展，转向加强政府机构与民间机构的合作，根据市场变化制定产业政策，主动及时地回应私营部门的需求，由监管为主转向服务为主，并协调市场主体之间的利益分歧和冲突，以促进可持续的增长。现任总统朴瑾惠提出了“创造经济”的执政理念，通过技术创新和人才培养提升整体产业高级化，重点是支持新技术行业增强引领世界市场的能力。针对中小企业发展的瓶颈问题，在中小企业大规模推广产业革新运动，传播与大企业之间共同成长的文化，引导私营机构根据行业未来自发性投资，以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今后5年重点扶持1万家中小企业，支持改造生产技术，共享创新成果；培育400家年出口在1亿美元以上的中小企业，帮助拓展海外市场。

（作者系广东省工商联党组副书记）